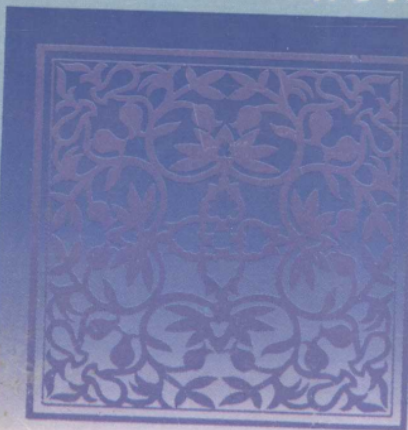


郎樱著

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

XIFANGWENHUA
FULEZHIHUIYUDNOGX



东西方文化

FULEZHIHUIYUDNOGX
XIFANGWENHUA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淑梅 封面设计:安康

FULEZHIHU

ISBN 7-228-01935-0 I·650 定价:3.30元



郎 櫻 著

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

新疆人民出版社

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

郎 樱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沙湾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5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1700册

ISBN7-228-01935-0/I·650 定价：3.30元

导 言

当辉煌一时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被历史的尘埃封盖，欧洲文化在封建诸侯与罗马教会严酷的统治下处于中世纪低谷之时，在东方，以长安为中心的盛唐中华文化和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却正经历着最繁盛的时期，其影响东至朝鲜、日本，西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之南部，出现了欧洲万马齐喑、东方欣欣向荣的文化格局。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代起，它就步入国际文化舞台，与东西方各国各民族人民广泛地往来与交流。经过魏晋时代对于各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为唐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在文化方面采取开放政策，广泛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及东西方各国文化，摄取其精华，丰富自己，使盛唐文化多姿多彩。然而，随着唐朝盛世已去，盛唐文化逐渐衰微。但是此后，作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却显现出生机和勃发之势。

在南方，以彝族、白族为主体的南诏、大理政权时代（8—13世纪）的文化及包括壮族、侗族、水族等先民在内的百越文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兴盛；在西南，10—12世纪，藏族喇嘛教文化已形成；在北方，契丹文化的影响日渐增强，蒙古族文化也在兴起之中；在西部，9—13世纪，以吐鲁番和喀什噶尔为中心的维吾尔文化，则以其独特的魅力异军突

起，引起世人的瞩目。

维吾尔民族现拥有667万多人口，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维吾尔民族发祥于漠北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的山林草原地带。先民善骑射，性强悍，常年驰骋于漠北高原，自古与中原汉朝廷过从甚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公元8世纪，维吾尔人的祖先曾在漠北高原上创建起一个赫赫有名的回鹘汗国，雄踞漠北达100年之久。

公元840年，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因天灾人祸，最后被黠戛斯所灭。于是，大批回鹘人西迁，与早已生息繁衍在西域的维吾尔同胞及突厥各部族人民汇合，与具有高度文明的西域原居民族融合，形成强大的、具有新生活力的维吾尔民族。

回鹘人新迁入的西域，自古是丝绸之路要冲，各种古老文明的交汇之处。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维吾尔民族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得以从古老的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汲取营养。维吾尔民族文化于悄然之间茁壮成长起来，至11世纪之时，他们几乎是在同时向世界推出两部孪生惊世巨著，一部是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于1069—1070年在喀什噶尔完成的哲理性诗剧《福乐智慧》，另一部则是维吾尔族语言学家、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于1072—1074年间在巴格达完成的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式的《突厥语大辞典》。这两部巨著的诞生，曾强烈地震撼东方文坛。犹如巨人般拔地而起的维吾尔族文学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两部不朽之作，不仅是维吾尔民族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它们亦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异彩。

9—13世纪的维吾尔文化是维吾尔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300年间，维吾尔人中诗人学者辈出，作品一部接一部问世。喀什噶尔成为中亚著名的文化中心，讲学堂、图书馆相继创建，来自中亚各国各民族的诗人学者荟萃此城，交流学问，切磋问题，学术气氛浓厚。这时期的维吾尔文化，犹如矗立于中亚大地上的一座灯塔，光芒四射，把中华文化的影响扩展到西方。

一、一部不朽的东方名著

《福乐智慧》(kudatoqubilik)是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名著，它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中成书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一部诗作。它是9—13世纪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这部作品全系用韵文写成，洋洋1.3万多行，由两篇序言（散文、韵文各一篇）、85章正文以及3个附篇构成。

这部诗作的结构及表现手法十分独特。作品的开端部分，诗人采用波斯、阿拉伯诗歌惯用的手法，开篇3章是对真主、先知以及先知四位伙伴的赞颂，接着是对美丽的春天以及当时的统治者——喀拉汗王朝的布格拉汗的赞颂。4篇赞词之后，作者又用去整整6章的篇幅阐述自己对于天体、人类的价值、智慧、知识、善行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从11章以后，作品的主人公才陆续登场，情节才逐渐展开。

这部诗作有人物，有场景，情节的进展及人物的观点全

部采用对话形式加以表述，人物的动作也交待得比较清楚，是一部哲理性很强的诗剧。

这部诗剧的主要人物有四位，他们是日出国王（Kun tooqdi），月圆大臣（Ai toldi），月圆之子、贤明大臣（Oktulmix），隐士觉醒（Odoqurmix）。

诗剧的情节也比较单纯，大致包含如下三个部分：

一、日出国王公务繁忙，需求一名助手。温顺、贤良、富有智慧的月圆毛遂自荐，受到日出国王的器重，被委派任大臣之职。月圆大臣辅佐国王精心治国，国泰民安，成就卓著。但不幸染病，临终前他将幼子贤明托付给日出国王。

二、贤明在日出国王的培育下长大成人，并继承父业，当了大臣。他智慧超群，才能出众，他向国王阐述了自己的施政主张与治国之道，诸如国君、大臣、武将、外交使臣等统治者及官吏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应尽什么职责；国君应如何对待哲人学者及工农商牧等各行各业的黎民百姓等等。贤明比其父月圆知识更加渊博，才能更加卓著，政治抱负亦更加宏伟。他成为日出国王忠诚之臣，须臾不可离的助手。

三、日出国王思贤若渴，他从贤明处得知他的族友隐士觉醒才学不凡，具有远见卓识，于是有意请隐士觉醒出山，让他与贤明一起辅佐他执政。他让贤明持他亲笔写的邀请信函去拜会隐士觉醒，但出山参政一事遭到觉醒的拒绝。日出国王并不善罢干休，令贤明“三顾茅庐”，隐士觉醒勉强同意出山与日出国王一见。他向国王面陈自己的观点，他说“皇室宝座无非是一场幻梦”，“不要祈求在长夜中尽享欢乐，真正的欢悦存在于来世”，说毕匆匆返回山林，不久，他便离开了尘世。

贤明大臣为觉醒之死十分悲痛。隐士觉醒之死促使他反省自己的一生。他于悲痛中解脱出来之后，又一如既往，兢兢业业辅佐日出国王执政。在他们的治理下，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这部诗剧情节发展的脉络异常清晰，人物的塑造具有很强的象征性。作者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以深刻的寓意，他在诗文中做了这样的说明：

日出国王象征着公正、法度；

月圆大臣代表了欢乐幸福；

贤明大臣代表了智慧，提高了人的价值；

我赋予隐士觉醒以“来世”的含义。

(353—358行)

通观全作可以看出，塑造这些人物形象并非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福乐智慧》的主要目的，诗人力图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相互间的辩论抒发自己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日出国王、月圆大臣、贤明大臣或是隐士觉醒，均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思想观念的载体。

鲜明的戏剧特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以及极强的哲理性，使《福乐智慧》区别于当时在东方盛行的抒情诗和叙事诗。而这部诗剧规模之宏伟、社会内涵与政治见解之深刻，更是当时东方一般诗歌所不及。

这部诗作涉及面甚为广阔，政治、哲学、经济、宗教、语言、文学、教育、军事、外交以及天文、地理、几何、数学几乎无所不包，是一部融诗情与哲理于一体、内容与形式十分和谐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为研究中世纪维吾尔及突厥

诸民族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以及意识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具有多学科学术价值。

这部诗剧——无论是其艺术形式，或是其内容，都十分新颖、独特。它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特色，同时又包含着一些西方文化的特点，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融东西方文化精华于一体，集各种古老文明于其中，这是《福乐智慧》最为突出的一个文化特点，这也正是这部诗剧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史价值。

二、《福乐智慧》之沉浮

西域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西域的文化在人们的心目中亦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一望无垠的沙漠中传来的阵阵驼铃声，引发起人们的怀古幽思；被黄沙埋没的城镇、寺院和陵墓，更像谜一样牵动着世界各国的“丝绸之路迷”们的心，使他们驱之若骛。

西域文化有许多不解之谜尚未揭开，《福乐智慧》之沉浮就是一例。

《福乐智慧》中有这样的诗句：

当此回历四六二年之际，
我写完了此书，即将搁笔。

仅就我心智所及，写出了心声，
愿读者从其中各取所需。

(6495—6496行)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福乐智慧》完成于回历四六二年，即公元1069—1070年间。

从《序言》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作者将此诗稿献给了当时喀拉汗王朝的统治者桃花石·布格拉汗哈桑·依宾·苏莱曼。由于这部诗作，诗人尤素甫受到苏莱曼汗王的器重，他被赐予“哈斯·哈吉甫”（御前近侍）的称号。

《序言》还记载，此作品问世后，轰动东方。中原的汉人，北方的契丹，西方的伊朗人都曾给予这部作品很高的评价。从后来抄本的发现地——开罗（埃及）、赫拉特（巴基斯坦）、费尔干纳（现苏联哈萨克斯坦）的分布情况来看，亦可想象得出，作品问世后，由于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语言优美，富于深刻的哲理性，所以诗作虽长达1.3万余行，但是人们仍然争相转抄传阅，流传地域亦远远超出维吾尔民族居住地域，在东方各国各族人民群众中曾流传甚广。在中亚耶亦克河口附近发现了一件陶器，上面刻有摘自《福乐智慧》的诗句，这表明，《福乐智慧》问世后，曾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亚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

但是，在中亚政权频繁更迭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乱之中，11世纪维吾尔民族的两部惊世巨著——《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辞典》的手稿与抄本均不幸失落了。以后，虽然在各种古籍及其他诗人的诗作中，曾多次出现过这两部著作的名字，在民众中也一直流传着关于这两位大学者的种种传说，然而，这两部著作却如同针落大海，从此杳如黄鹤。时间的帷幕无情地把这两部巨著与世间隔绝了长达几百年之久。在中世纪曾光芒四射、煊赫一时的维吾尔文化，随着这两部巨著的失落，随着历史的变迁，渐渐地被世人淡忘。

埋在地下的珍宝，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挖掘出来，恢复它们的光泽，恢复它们的价值。马王堆汉墓的发掘，秦代兵马俑的出土，曾引起世界性的轰动，继之而来的便是波及世界各国的“汉文化热”。

失落的文学巨著，犹如掩埋于地下的珍宝，总会有重见天日之时。19世纪，帷幕终于开启，《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辞典》的手抄本陆续被发现，沉睡了几百年之久的不朽名作得以重新焕发青春。这两部著作的失而复得和刊布，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轰动，成为19、20世纪世界突厥学界最伟大的事件。

一百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对于这两部著作的校注、整理、翻译及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继“突厥学热”、“维吾尔文化热”之后，带有世界倾向的“丝绸之路文化热”正方兴未艾。世界学术界对于中世纪兴盛一时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古代维吾尔文化所持有的兴趣亦日渐浓厚。

这两部巨著的失而复得，不仅关系到重新认识、评价维吾尔族文化史，也关系到世界学术界对于东方文化的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福乐智慧》的手稿至今尚未发现，目前传世的是后人的手抄本。《福乐智慧》的手抄本现已发现三种，即维也纳抄本、开罗抄本以及费尔干抄本。

维也纳本

这是最早发现的一个抄本。它是《福乐智慧》问世370年后，由一位名叫哈桑·喀拉·沙依勒·谢米斯的人于1439年在赫拉特城（今阿富汗东北部）用古代维吾尔文字——回鹘文抄写成的。抄本发现时已残缺不全。18世纪末，在赫拉特城供职的

奥地利东方学家普尔戈什塔里将此抄本带回维也纳，存于维也纳国立图书馆。因此，一般称之为维也纳本，也有称作赫拉特本的。这个抄本在维也纳图书馆悄然度过了100年，直到19世纪末，才由万别里和拉德洛夫两位学者将这个抄本的一部分标音转写、翻译，刊布于众。

开 罗 本

这个抄本用阿拉伯字母抄成，共16600行。学者们对此抄本进行研究，估计它的抄成时间不会晚于14世纪上半期。此抄本现存开罗的凯地温图书馆，19世纪末，由凯地温图书馆主任、德国人穆里蒂兹博士首次将此抄本刊布于世。

费 尔 干 抄 本

此抄本用阿拉伯字母抄成。1913年，学者维利多夫在中亚费尔干纳地区费尔干城的一家私人藏书室内发现了它，后又失落。直到1925年，一位乌兹别克族学者才将此抄本寻找到。这个抄本发现的时间虽然较晚，但是，这个抄本是目前所发现的各种抄本中最为古老、最为完整的一部抄本，约抄成于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

著名的土耳其学者R·L·阿拉特对上述三个手抄本进行勘校，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在1947年出版了《福乐智慧》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本。这个勘校本比较科学，比较完整，成为各种文种译本的依据，也成为研究《福乐智慧》所依据的主要版本。

目前，国际上已有俄、英、土、汉、乌兹别克五种文字的《福乐智慧》全译本，以及德、苏联的哈萨克、阿塞拜疆等各种文字的摘译本。

在我国，197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首先出版了由耿世民和

魏萃一合译的《福乐智慧》汉文节译本，这是向我国学术界较为系统地介绍《福乐智慧》的第一部译著。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同志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完成了《福乐智慧》现代维吾尔文与拉丁字母转写的原文对照本，于1984年出版。接着，郝关中、刘宾、张宏超三人合译的《福乐智慧》汉文全译本脱稿，并于1986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

至此，沉没失落了几百年之久的《福乐智慧》才得以回归故里，重见天日。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三、喀什噶尔——世界四大古老文明 的交汇之地

喀什噶尔是维吾尔与中亚文化的中心，是矗立于中亚的一座灯塔。9—13世纪，是维吾尔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两部杰出代表作、具有世界影响的《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辞典》，都与喀什噶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突厥语大辞典》的撰写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是喀什噶尔人。《福乐智慧》的作者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不仅在喀什噶尔创作了这部不朽的名作，他本人也曾长期生活于这座城市，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去世后又葬于此处。只有对喀什噶尔的历史与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才有可能对维吾尔文化的特质、对《福乐智慧》多层文化结构特点有更深理解与认识。

喀什噶尔是我国西北边陲的一座文化古城，它位于塔里木盆地西端。“气候和畅，风雨顺序”，土质肥沃，渠水潺潺，五谷丰登，绿树成荫，果园成片，如同是镶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沿上的一颗绿宝石。

喀什噶尔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公元前120年张骞通使西域时，喀什噶尔地区是当时著名的西域国家疏勒国的所在地。公元初，东汉的班超通使西域时，他不仅到过疏勒国，并在那里苦心经营十余载，创建起西域都护府，疏勒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公元7世纪，唐朝在疏勒置都督府，疏勒都督府与于阗、碎叶、龟兹三个都督府并列，成为唐代著名的安西四镇。

喀什噶尔之称最早见于新罗僧人惠超（？—780）的《往五天竺国传》，书中记载疏勒又有“伽师祇离”之称，宋僧慧琳在《慧琳音义》中称之为“伽师佉黎”。11世纪与《福乐智慧》同时代的《突厥语大辞典》上则明确其城读音为“喀什噶尔”（Ka š rar）。明代称“哈实哈尔”，清代称“喀什噶尔”，现称作“喀什”，维吾尔语中仍称“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地区自古是交通要道。起源于长安的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之后便分为南、北两路：南路途经罗布诺尔、米兰、且末、和田；北路途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于喀什噶尔交汇，然后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分别通往阿富汗、波斯、印度及中亚各国。

喀什噶尔地区处于南北丝绸之路交叉点，它不仅成为东西方贸易必须之重地，而且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世界上各种古老的文明，世界上几大有名的宗教，均于此交汇。一些国外的学者将此地区形象地比喻为“国际文化的十

十字路口”。

在喀什噶尔的多种文化交汇中，中原汉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地区自汉代起就已划归我国版图，并且一直是中央朝廷历代西域都护府的所在地。汉族的官吏、屯田的士卒、浩浩荡荡的商队以及众多去西天取经的僧侣，常年往来不断。喀什噶尔的地方政权亦一直与中原朝廷保持着密切的政治与贸易的联系。他们派使者赴中原，而民间涌入中原的商贾更是不计其数。

喀什噶尔地区的居民一向认为他们居住在中国领土之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喀什噶尔人马合木德在撰写《突厥语大辞典》中的“桃花石”(tarǝqɑq)条目时这样写道：

“桃花石”是“马秦”之称。秦原来分作三部分：（一）上秦，地处东方，被称作“桃花石”；（二）中秦被称作hitay（契丹）；（三）下秦被称为barhan（巴尔罕），这就是喀什噶尔。

他在“坎德”（Kand）条目中再次强调，喀什噶尔是下秦。他说：

“坎德”为城市、城镇之意。喀什噶尔为“幹尔朵坎德”，意思是“君王居住的城市”，这个城市气候宜人，突厥可汗阿夫拉西亚甫曾在此居住过。这里就是下秦。

众所周知，自古“秦”一直是外国及其他民族对中国的称法。11世纪出身于喀什噶尔的维吾尔族著名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地指出喀什噶尔是组成秦的三部分之一，这表明居住于西域的维吾尔族人民群众自古有着强烈的祖国观念，他们一直把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一

员。《突厥语大辞典》在“桃花石”条目中曾写道：“突厥中的一部分人居住在桃花石地区，所以称他们为‘塔特桃花石’（tat taroq），‘塔特’是回鹘人，桃花石是秦人。”问题更加清晰、明确了，在11世纪维吾尔人的心目中，喀什噶尔是秦的组成部分，居住在秦地的维吾尔人又称“塔特桃花石”，而“塔特桃花石”意译过来，即“秦人维吾尔”，也就是“中国的维吾尔人”。

公元840年，漠北的回鹘汗国覆灭，大批回鹘人西迁，其中一支迁到喀什噶尔，有些人继而向西挺进，翻过葱岭，抵达葱岭西地域。他们建立起以维吾尔人为主体的、包括突厥诸民族及部分操伊兰语民族在内的喀拉汗王朝。喀拉汗王朝的统治者们经常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以“桃花石”字样，例如对《福乐智慧》及其作者予以高度评价的驻喀什噶尔的汗王哈桑·伊宾·苏莱曼，他的名字前面就冠以“桃花石”之称。当时塞尔柱王朝的一位宰相在他的著作《治国策》中记载说，喀拉汗王朝的一些统治者经常戴有“东方与中国之王”的封号。这说明，喀拉汗王朝创建伊始，王朝的统治者就把自己视为中国的汗王，并以此为荣。

政治上密切的联系，必然会导致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交流。维吾尔人在漠北时期与中原近在咫尺，过从甚密。他们迁到西域后，也一直与中原朝廷与汉族人民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汉文化在喀什噶尔地区，在维吾尔民众中的影响是至深的。

喀什噶尔地区与印度为邻，是中原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印度的佛教于公元1世纪已传入和田地区，并很快传入喀什噶尔。10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漫长年代里，喀什